

论“语-图非合作关系”及其意义生成

刘依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在关于“语-图”的已有研究中,“语-图”互仿尚不能很好地解释“语-图”合体中存在的“驱逐”“解构”等“语-图”不一致现象。从言语交际角度出发,参照语用学相关研究,我们将其命名为“语-图非合作关系”,通过探讨这一现象在现实语境中的实际特征、现实根据和发生条件,以及“语-图”不一致所具有的构成关系和表意原则,发现其意义生成因循关联原则,受话者通过“语-图”特定关联性推理会话含义的认知机制。作为发话者的语言符号或图像符号故意违反合作准则来传递隐含含义,发话者故意不遵守合作准则,但目的不是中断交流,而是让受话者根据关联原则,超越“语-图”符号的表面意义去设法寻找两者的关联性,推理发话者所说语-图符号的会话含义,实现最佳语境效果。

关键词: “语-图非合作关系”; 格赖斯合作原则; 会话含义; 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1-0161-07

在关于“语-图”的已有研究中,对“语-图”合体的探讨已经很多,但是在复杂的“语-图”关系中,“语-图”互仿尚不能很好地解释“语-图”合体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现象。如在“语-图”合体中,语言有时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图像进行修辞,或是通过图像符号加强语言的意义,而有时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以拐弯抹角、繁琐冗长,甚至是相违背的方式进行“语-图”修辞。换言之,“语-图”合体时,是否必须合作,是否必须遵守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的原则?赵宪章在《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中指出,语言与图像有不同的符号属性,因此,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时,就有可能出现语言对图像表现为“驱逐”和“解构”^[1]。在《“语-图”互仿中的图文缝隙》一文中,张玉勤已经注意到这种特殊“语-图”表达形式的表意差异,将其表述为“语-图”中“存在着非对等性、非对称性甚至相互抵牾的特质,由此带来‘缝隙’”^[2]。吴昊在《语言和图像的共生与背离论析》中,援引罗兰·巴特的观点,从话语含义的角度出发,将“语言与图像的背离”定义为:“语言和图像从其阅读方式的对抗,到审美风格和艺术价值的齟齬,再到其多义的舍弃和撕扯,全方位地完成二者意义间的相互解构。”^[3]

我们仍需阐述这种特殊“语-图”表达形式在现实语境中的实际特征、现实根据和发生条件,以及“语-图”在这一特殊语境中具有怎样的相互构成关系和

表意原则。语-图的表意差异并不是语言表意与图像表意的简单排斥或者叠加,“语-图不一致”形态更加不是语言对图像、或者图像对语言的欺凌,而是语言与图像之间张力关系的语境凸显。如果从关注语境的语用学角度出发,把对语言与图像这一关系的考察纳入到发话者、受话者和会话命题中^①,就会发现“语-图”符号原本指示性的、规定性的会话含义,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境重组,可能转化为评价性的、言有所为性的会话含义,而非简单的解构或撕扯。

从“语-图”互仿到“语-图”不一致,前者的统一表意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所约定的符号表意活动。而“语-图”不一致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体现,通过“语-图”间的非合作形态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意愿,通过符号间的对抗与游戏,突出对方符号含义的不合理性,这与反讽、对比乃至形式主义分析中的陌生化有着一定相似^②。在语言符号的互动过程中,上下文语境或者说符号的预设性都构成其意义来源的基础。作为两种基本的表意符号,“语-图”共在所构建出的意义图景同样因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又相互协作的上下文语境。然而,就“语-图”间的非合作形态而言,其形态与反讽、对比乃至形式主义分析中的陌生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语-图”不一致是在语言与图像表意原则上形成的协作机制:图像以其空间性借助并超越了语言的表意规则,得以与语言构成了反制约的张力关系。

收稿日期: 2016-05-13; 修回日期: 2016-11-01

作者简介: 刘依(1989-),女,重庆永川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

一、“语-图非合作关系”及其特征

(一)“语-图”研究与“语言应用”

“语-图”非合作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能与语言应用研究发生联系主要源于两者的中介：语境中的语言符号。仅从表面看，很难将格赖斯的具体观点乃至其后的关联理论、赛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与“语-图”非合作关系划上等号，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重要关联。尽管“语-图”合体不能完全等同于语言交流，但若把“语-图”合体的发生看作是一种动态的符号交际，这就可以与运用中的言语会话相参照。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提出“意义就是使用”，主张“话语(utterances)只有联系各种活动或语言博弈才能解释清楚”^{[4](145)}。更进一步将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的交往范围拓展：“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149)}赵宪章在《语图符号学研究大有可为——“文学图像论”及其符号学方法》中指出：“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既然建基在语言哲学层面，既然将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那么，‘言说’与‘图说’‘语象’与‘图像’的学理探讨也就成了它的核心话题。”^[6]事实上，“语-图”研究与语用学研究都涉及到语言符号在具体语境中存在的间接性表意这个核心问题。不同之处在于，“语-图”研究的符号构成是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之间的交际行为，需要考虑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表意原则，而语用学则专注于语言符号在交际中的具体使用情况，通过语境研究语言的真实含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运用语言的理论”^{[7](101)}。正如列文森所说：“语用结构的各个方面都是以运用中的会话为中心组织起来的。”^{[8](145)}可以看到，尽管语言应用研究强调以运用中的会话为基础，没有把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可能交流纳入考虑的范畴，但“言说”与“图说”、“语象”与“图像”的“语-图”共在同样无法脱离具体语境。只是图像以其空间性借助并超越了语言的表意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语-图”研究与语用研究在内部逻辑上存在一致性。正如 Sperber 和 Wilson 所说：“语用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对于任一给出的话语而言，听者怎样去发现一种能使自己充分理解该话语的语境。”^{[9](167)}更进一步说，不同于语义学、语法学研究，语用学研究与作为思想资源的解构主义有着不可忽视的深层关联，这为我们理解语图不一致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基于此，本文参照格赖斯对合作原则的补充，以及 Sperber 与 Wilson 的关联理论^③，将这一特殊“语-图”表达形式概述为“语-图非合作关系”。

(二)“非合作原则”的提出

在《逻辑与会话》的演讲中，格赖斯第一次提出语用学意义上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④：“即在参与交谈时，要使你说的话符合你所参与的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10](56)}格赖斯认为，在一般意义上，人们交谈过程的推进需要基于一个或一组共同的目的或方向，不符合交谈目的或方向的话语会被删去，以确保交谈能够继续，可以看作是语言交流的基础原则。不难看出，“合作原则”事实上有过分理想化的倾向，在现实的语言交谈中往往存在例外。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甚至认为：“普通语言中约 70% 的表达方式来自于隐喻概念。”^{[11](71)}可见，在现实交流中，不符合“合作原则”的情况已不再是“例外”。基于此，格赖斯补充出四种可能不遵守“合作原则”的情况：“(1)说话人宣布不遵守合作原则以及有关准则。(2)说话人可能悄悄地、不加声张地违反一条准则。这样，在有些情况下他就会把听话人引入歧途。结果使听话人产生误解或受骗上当，例如‘说谎’。(3)说话人可能面临一种‘冲突’的情况，即为了维护一条准则而不得不违反另一条准则。(4)故意违反或利用某一准则来传递会话含义。说话人故意不遵守某一条准则，即说话人知道自己违反了某一条准则，同时还是听话人知道说话人违反了该条准则，但目的不是中断交流，而是为了向听话人传递一种新信息——会话含义。”^{[12](57-58)}上述四条准则，可以视为对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补充，也是本文探讨“语-图非合作关系”的基础，相较于 Sperber 与 Wilson 的关联理论，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补充条款在区别“语-图非合作关系”和分析发话者意图上，更符合“语-图非合作关系”研究的实际情况。然而，由于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补充条款过于强调对合作原则的违反，相较于 Sperber 与 Wilson 的关联理论，对“语-图非合作关系”意义生成机制的探讨却较为笼统。因此，本文将在格赖斯会话理论的基础上，同时结合 Sperber 与 Wilson 的关联理论对其作出的补充，不再一味强调“语-图非合作关系”对合作原则的违反，而是关注“语-图”符号本身和语境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使人们对说话人的意图作出合理的推论，从而对“语-图”符号作出正确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符合非合作原则的“语-图”命题都含有特殊性会话含义，我们据此将其细分为“语-图”隐喻、“语-图”夸张、“语-图”反话等“语-图”图非合作命题。

(三)“语-图非合作关系”的不同特征

尽管语言和图像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常常呈现出

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但在绝大部分“非合作原则”“语-图”命题中，语言与符号的组合不能直接为受话者提供充分的关联可能^⑤。可以想见，在“语-图非合作关系”中，发话者往往会通过语内增词引申、图内加注、类比替换等措施重构语义原型。列文森认为：“字面意义和实际想要表达的意义有差别，这是不同义句的选择；这时的表达形式必为有标记成分。”^{[13](80)}换言之，标记成分往往呈现出冗长表达或非常态表达的特征，具有鲜明的表达形式。如雷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的名作《形象的背离》。



图1 [比利时]雷内·马格里特 《形象的背离》(1928—1929)
布面油画 纵 63.5 cm 横 93.98 cm 洛杉矶艺术博物馆

图1中，有一个精致的可以乱真的烟斗，但在烟斗下面却清晰地写着“这不是烟斗”，这是一个典型的“语-图”反话。马格里特是用清晰而写实的画面去扰乱理性思维的正常逻辑，利用这种矛盾去揭示“语-图”关系中存在的深奥性、悖谬性。这种“显而易见的事件”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语-图非合作关系”特征的标记。然而，并非所有的“语-图非合作关系”对应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补充条款情况都是一致的，如马格里特的《词语与图像》(Les Mots et les images)的插图以及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的《佛洛伊德》系列作品。

图2中的文字、图像显然包含着极大的随机性，具有其指称之对象所不具备的功能，可以被纳入到对“语-图”含混、“语-图”晦涩的探讨中。在这幅提名为《词语与图像》的作品中，马格里特所提倡的“语-图”合体实验，是对图像中的语汇进行置换尝试，分析“语-图”合体中存在的不同“语-图”组合所能产生的语境效果。这种尝试的随意性将“语-图”合体拖入到含混与晦涩的意义空间内，同时也呈现出语图不一致形态的细腻差异，为我们理解“语-图非合作关系”的丰富层次提供了可能。

反观图3，倒立的人或物，是格·巴塞利兹(Georg



图2 [比利时]雷内·马格里特 词语与图像 十八张素描
图像用黑色印度墨水画出，它们作为“插图”被插入一篇蓝色墨水书写的文字^⑥



图3 [德]格·巴塞利兹 弗洛伊德(Sigmund), 141×111 cm,
布面油画, 2000, 在展

Baselitz)绘画中的典型图像。《弗洛伊德》系列中，“Sigmund”是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名字，同时也是画家巴塞利兹的狗的名字(Sigmund)。在这幅“语-图”作品中，巴塞利兹采用语图倒置的表现方式，完成对“狗”的意象和佛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暗示和语言上的双关，实现了新表现主义的意义重构。在这些包含大量含混的、倒置的、夸张的“语-图”作品中，存

表1 “语-图非合作关系”会话命题及其特征

语-图标记 关联性			命题特征 W: word; I: image
违反“量的准则”	语-图含混	弱	言说 W 的字面意义与图说 I 的图像意义相反, 且缺乏有效信息说明命题会话含义。
	语-图反话	强	言说 W 的字面意义与图说 I 的图像意义相反, 语境对这一语图命题的表面含义呈现出明显的歪曲, 言说 W 的关联性强于或弱于图说 I 的关联性, 导致命题会话含义倾向于 W 或 I。
违反“质的准则”	语-图隐喻	强	言说 W 的字面意义与图说 I 的意义存在明显的范畴谬误, 但言说 W 与图说 I 仍然存在同时明显的概念映射关系, 并因相互的存在而加深彼此含义的理解。
	语-图夸张	中	言说 W 的字面意义与图说 I 的图像含义存在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等方面着意夸大或缩小, 以取得陌生化等特殊会话含义。
违反“方式准则”	语-图晦涩	强	故意违反“方式准则”中的“避免晦涩”, 言说 W 的字面意义跟图说 I 命题会话含义故意晦涩, 以避免陈词滥调, 营造耐人寻味等特殊的会话效果, 传达不可告诉第三者的含义。
	语-图双关	强	故意违反“方式准则”中的“避免歧义”, 并故意使用言语 W 与图说 I 之间的双重歧义来产生特殊的会话含义。
	语-图冗长	弱	故意违反“方式准则”中的“简炼”, 以冗长的表达方式将言说 W 与图说 I 组合起来, 增加语-图命题中不必要的信息, 以冗长方式增强言说与图说的语境效果。
	语-图倒置	弱	故意违反“方式准则”中的“有条理”, 言说 W 与图说 I 之间缺乏清晰的条理, 或以空间倒置的方式打破常规条理, 有意识地确保会话含义趋向开放或产生颠覆性会话含义。

在不同程度的“语-图非合作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违反格赖斯合作原则的不同情况, 将“语-图非合作关系”的命题细分为“语-图”反话、“语-图”隐喻、“语-图”倒置等。

二、“语-图非合作关系”的意义生成及其限制

(一)“语-图非合作关系”与最佳语境效果

一般而言, 动态交际中的“语-图非合作关系”是以符号语境为交际基础的。语境或者说假设语境, 是指语言使用的环境, 可以看作是“语-图非合作关系”发生的重要的条件之一。这里探讨的“语境”概念包含三重含义: 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心理语境。波兰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knowski)率先提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两个概念。社交语境如文化语境、社交结构和社交能力为“语-图”交际提供社会变量和动因。情景语境构成“语-图”交际的外在动因, 随着交际双方的“共谋”——“语境对意义的生成和理解有选择和构成的作用”,^[14](385-406)]从而实现语境含义的增值, 实现最佳语境效果^⑦。如徐冰的作品《析世鉴——天书》(1987—1991)(见图4)。

这幅语-图隐喻作品以汉字为型, 拉丁文为体, 书写近四千多个“伪汉字”, 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按宋版书制作成册和几十米的长卷, “这让这些字在严肃的形式下多少有了些解构和滑稽的意味。”^[15]徐冰强调:



图4 徐冰《析世鉴——天书》1987—1991 混合媒体装置/手工印刷书籍和卷轴 中国美术馆

“这是一本在吸引你阅读的同时又拒绝你进入的书, 它具有最完备的书的外表, 它的完备是因为它什么都没说, 就像一个人用了几年的时间严肃、认真地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天书》充满矛盾。”^[16]就这一充满矛盾的“语-图”作品的文化语境而言, 如果说虚无是徐冰对现代美学的追求, 那么在图像时代, 这种以汉字为型、拉丁文为体的语图隐喻方式, 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恰恰调和了语言与视觉关系过于直观和确定性的一面, 扩大了观者的当代阅读想象和文化认同, 推动“语-图”作品通过非合作方式实现对“严肃”“认真”“意义”的调侃, 揭示出潜藏在“语-图”虚无隐喻之下的对于严肃意义的语境追求。

另一方面, 本文谈到的“语境”还是一种心理语境, 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构成物。也就是说, 最佳语境效果的获得, 不仅包括文化语境、交际语境等因素,

也包括一个人的主观知识因素，如记忆、特定情绪以及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与发话者的言语意图能否对话、实现共感。在这一过程中，发话者与受话者通过经验或思维把有关语境表现为“语-图”符号。当语言与图像符号进入“非合作关系”中，交际双方对对方所传递的信息都不再局限于符号的本身意义的利用和理解，而是要借助于语境的主客观因素所提供的情景意义来弥补其自身的不足。^{[17](459)}最终，在特定语境所提供的“语-图”各自的背景知识的合体中，实现最佳语境效果。

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有时遵守“合体”原则，而有时却故意违反“语-图”合作的原则，以拐弯抹角、繁琐冗长进行“语-图”修辞，正是基于这种最佳语境效果的筛选策略。发话者与受话者面对“语-图”命题在不同的文化语境、情境语境和心理语境随机重组，通过以下两种原则进行会话含义的推导：①最大限度地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②最大程度地增加话语的语境效果。^[18]从而排除掉多种“语-图”组合，实现最佳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目的。这就是“语-图”合体在交际语境中的基本表意原则。

(二)“语-图非合作关系”与关联原则

尽管我们已经明确了“语-图”合体在交际语境中的表意原则，但是“语-图”非合作关系的表意方式，事实上超出了关联原则所规定的“最大限度地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那么关联原则在解释“语-图非合作关系”的意义生成上，是否就失效了呢？

答案并非如此。语言与图像符号有各自特殊的表意规则，语言符号或图像符号与其所依赖的文化语境和观者认知模式能够产生联系的能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基于符号关联性的差别，“语-图非合作关系”的表意原则是存在限制的。图像和文字相互指称方面的区别和联系、各自被感知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在指称表达精确性上的区别和联系、会话含义在言说与图说关系中被固定下来的情况也是不同的。Sperber 和 Wilson 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关联理论”，从认知学的角度或者说接受者角度阐述并修正了格赖斯的会话理论。本文假设，基于“语-图”合体的基本表意原则，当语境中的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进入到非合作关系中，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对原有“语-图”命题进行语内或语际阐释的推理过程，受话者需要通过推理来寻找语义原型(Blueprint of meaning)和“语-图”命题的会话意义及其被激活的相关语境之间的关联性。即在“语-图非合作关系”中，尽管“语-图”

符号本身的关联性因为非合作关系而递减，对“语-图非合作关系”会话含义的理解似乎需要增加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但由于“语-图非合作关系”的表意特殊性，这一点限制其语境、会话含义的产生只能依靠相对特殊的语境。这种基于特殊语境的情况，受话者理解“语-图”命题会话含义时所付出的努力就降低了，这解释了“语-图非合作关系”的表意原则如何突破其限制因素的机制。

以“语-图”隐喻为例，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有些图像意象逐渐被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意味，成为民族心理积淀下的集体视觉印象。文化、意愿、心理因素通过语境进入到“语-图非合作关系”的重构中，只有掌握了这些图像的语境线索，才能理解这种特定的“语-图”表意关系。即使在极具现代性的语言中，如图像符号语言、或与创作个人密切相关的特定语境中，也能瞬间唤起观者的情感共鸣，感受到“语-图”背后蕴含的特殊观念基础和情感来源。如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作为负担的图像》(1993)，同样可以视为“语-图”双关的范例。



图5 [南非]杜马斯 《作为负担的图像》1993年 布面油画
纵 40 cm 横 50 cm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就语言文字而言，在英文中，“burden”作为名词，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①负担，包袱，责任，义务；②重点(诗歌与文学中)。就第一个意思而言，又可分成字面义和隐喻义两层。然而“图像”没有厚度与重量，却漫出了“图像再现真实”的边界，充斥于“真实”的领域之中，或将自己变成“真实”，这是语言对图像的调侃。这幅作品源于乔治库克电影《茶花女》的一个画面，画面是罗伯特·泰勒抱着葛丽泰·嘉宝[®]，但通过杜马斯的特殊处理，罗伯特·泰勒环抱葛丽泰·嘉宝的动作被表现出某种宗教关怀，隐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画作《岩边圣母》以及《圣经》中关于耶稣离世的插画。整个图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进入到杜马斯特有的“二手图像”私人语境中。杜马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媒介选取图像进行

再创作。宗教、暴力、色情等社会、文化主体成为杜马斯的图像主题。但通过绘画技法,原有图像主题之间强烈的对比被弱化。对于具有宗教背景和熟悉西方绘画传统的观者而言,道德隐喻被融入到杜马斯的语-图作品中,从而唤醒观众对图像原有事件之间的心理关系,产生更加强烈的关联性,并进一步激发语-图符号在欧洲先锋图像实验中的伦理效益。

可见,杜马斯的“语-图非合作”实验实际上是在对图像符号的伦理特征进行实验,即用新的意象来替换传统图像中已经原型化了的意象。但这种“语-图”关系中的伦理信息,在语言没有直接说明的情况下,只有具有宗教背景和熟悉西方绘画传统的观者能够领悟。因此,在言语交际中,关联性制约表达者的“语-图”命题组织和语义表达,同时也制约着接受者对“语-图”命题的表达。所以,“语-图非合作关系”必须根据关联性来建构话语和调节话语,接受者也必须根据关联性来理解话语,根据“语-图”关联性的变化来完善对话语信息的准确把握,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的语境效果。

(三)“语-图”—“语用”模型

由于本文是从言语交际角度研究“语-图非合作关系”的发生,所以,将“语-图”研究中存在的“语-图非合作关系”看做是以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会话含义为核心,以实现最佳语境效果为目的的有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语-图非合作关系”的表意原则及其限制因素概述为:在“语-图”合体中,随着语言或图像语义原型在特定语境中的变化,听话者通过关联原则推理话语意义的认知机制。作为发话者的语言符号或图像符号故意违反合作准则来传递隐含含义,发话者故意不遵守合作准则,但目的不是中断交流,而是为了让听话者根据关联原则,超越“语-图”符号的表面意义去设法推理发话者所说的“语-图”符号的隐含意义,实现最佳语境效果。基于此,结合格赖斯非合作原则的具体内容、Sperber 与 Wilson 关联理论及关联性等概念,构建语-图一语用动态模型(见图6)。“语-图”一语用动态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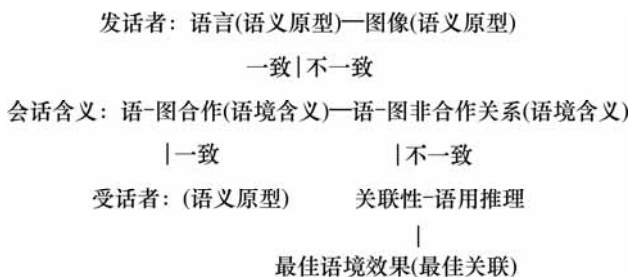


图6 “语-图—语用”语境效果模型

的提出,既通过引入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交际这一角度,丰富了语用学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完善现有的语-图研究。

四、结语

如果说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于像“语-图非合作关系”的观察与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对构成“语-图”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剖析,都会有助于我们获得对“语-图”符号特性更清晰的理解,那么在目前中国学界关于“语-图非合作”的互动范畴内,这样的研究还具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在一般的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受制于固定研究思路或既定研究方法的情况下,结合语用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型美学研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通过对这一关系的剖析,对它的发展方式的把握,我们得以一窥语言与图像在当代语境中的互动本质,从而探索“语-图”合体中出现的新的“语-图”张力。

注释:

- ① “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本是语用学的概念,即当说话人违反了这些准则或次准则的时候,听话人就迫使自己超越话语的表面意义去设法领悟说话人所说的话语的隐含意义。这种话语的隐含意义,即会话含义。在“语-图非合作关系”中,不同的语-图命题可能导致不同的会话含义。
- ② 据赵毅衡考证,反讽(irony)一词源自希腊语“eironeia”。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个被苏格拉底嘲弄的人以此批评苏格拉底,表示轻蔑、狡猾或欺骗之意,简单地说,可以被理解为“言义悖反”,这与本文所论述的“语-图不一致”就其表面含义而言有所切合。更深地说,反讽已成为语言哲学、心理学、文学批评、修辞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要命题,与“语-图不一致”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但考虑到语-图共在的表意结构,两者又存在显著的差别。
- ③ 这里的“非合作方式”并不单纯依据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补充情况,还参考了关联理论的基本原则:“第一,每个话语都可有多种理解(即可以明说、暗含和不同语境作出多种理解);第二,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能表达的全部意义都获得理解;第三,听话人往往用一种单一的、十分笼统的标准去理解他/她听来的话语;第四,这种标准足以使听话人对话语认定一种唯一的理解,排除其他可能的理解。”参见何自然:《Grice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 ④ (1)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 指所提供的信息的量。①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②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2)质的原则(The maxim of quality): 所说的话力求真实,尤其是:①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相关准则(The maxim of Relevance): 在关系范畴下,只提出一个准则,即所说的话是相关的。(4)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 清楚明白地说出要说的话,尤其要:①避免晦涩;②避免歧义;③简炼;④有

条理。见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6-57页。

- ⑤ 关联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能够解释和支配人类交际活动的关联交际原则。陈红在《关联理论和翻译》一文中指出:“它设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其本身都具有最佳关联性。对于交际者来说,要想取得交际的成功,实现其交际意图,必须寻求一种最佳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最佳关联并不是最大关联,而是适当关联。所谓最大关联指的是,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最小的处理努力就可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而最佳关联指的是,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付出适当的处理努力而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见陈红:《关联理论和翻译》,《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
- ⑥ 图2作品一共包括十八张素描,涉及多个语-图非合作关系命题:“1、有时一个对象的名称可以取代一个图像的位置。图像是左边一只拳头,中间一个箱子,右边是文字“大炮”,画面中的文字取代了图像。”见刘云卿.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68-69。
- ⑦ 最佳语境效果是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语境和话语内容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组合,受话者需要进行推理,以取得较好的语境效果。一般而言,“信息与语境的关联越弱,听话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而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少,话语同语境的关联必然越强。”见何自然:《Grice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
- ⑧ 关于“图像作为负担”的纪录片可详见:http://www.arttube.nl/en/video/Stedelijk/Marlene_Dumas。

参考文献:

- [1] 赵宪章. 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170-184.
- [2] 张玉勤.“语-图”互仿中的图文缝隙[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63-68.
- [3] 吴昊. 语言和图像的共生与背离论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6): 85-89.
- [4]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5]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 [6] 赵宪章. 语图符号学研究大有可为——“文学图像论”及其符号学方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0-08.
- [7]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8]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
- [9]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Kecskes, Istvan. Dueling contexts: A dynamic model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40): 385-406.
- [11] 徐冰. 天书奇谭——访著名艺术家、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08-08.
- [12] 徐冰. 艺术背后的现实语言[N]. 上海证券报, 2011-07-23.
- [13] 刘焕辉. 语境与言语交际[C]// 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14] 何自然、冉永平. 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J]. 现代外语, 1998(3): 1-8.

On “language-image non-cooper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generation

LIUY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previous studies on linguistic graphs, linguistic graphic inconsistency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in linguistic-metaphorical equivale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occurrence of verbal-image is regarded as a symbolic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tween language and image, and can be named as “language-image non-cooperation” in reference to pragmatics. On this basis, the meaning of “language-image non-cooperation” is generated by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rough the relevance-based reasoning. As the speaker of the language symbols or image symbols intentionally violates the cooperation criteria to convey the implied meaning, the speaker deliberately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cooperation guidelines, but the purpose is not to interrupt the exchange, but to allow the recipien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ssociation so as to transcend language, to find the relevance of the two, to reason the speaker's language-image meaning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o achieve the best contextual effect.

Key Words: language-image non-cooperation; cooperative principle;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contextual effect; relevance theory

[编辑: 胡兴华]